

十余年来的三语习得国内研究综述

李增垠

(青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基于新世纪以来国内三语习得研究整体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从三语习得名称的规约化、研究内容的多元化、语言迁移研究成果、影响因素研究成就、国外专著译介的作用等五个方面总结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的成果。同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有效的实证研究不足;二是研究对象范围狭窄,背景信息细化不够;三是研究的针对性不强,研究内容尚需深化;四是学术界重视不够,宏观发展严重不足。鉴于此,日后需要从多层面面对三语习得过程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探析。

关键词:三语习得;国内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7)04-0103-09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三语习得的真正关注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与之相比,国内三语习得研究要晚很多。在我国学术界,对“三语习得”研究的起点应从何时算起既没有明确的共识也没有鲜明的标志。目前,国内一些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的一个基本趋同但比较模糊的看法是开始于 21 世纪初。^[1, 2]从“CNKI 学术趋势”图可以看出,“三语习得”研究的“学术关注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7 年以前的关注度几乎为零,属于萌芽阶段;2008 年至 2009 年间的关注度开始走高,为开启阶段;2010 年以后的关注度持续直线上升,为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无论是研究的规模还是研究层次,国内三语习得研究还都属于初创阶段。可以肯定的是,国外对三语习得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及国内三语教学的现实要求及相关探讨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三语习得”研究越来越热的关注。CNKI 文献检索结果显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国内就有学者开始“三语”方面的研究了,比如,吴布仁探讨了蒙古族教育中“三语”教学的结构改革;^[3]余惠邦指出民、汉、英三语教学将成为中国教育双语制的一种新形式,预测其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4]扎巴从内蒙古教育改革的视角论述了“三语”教育系统的构建。^[5]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就其内容而言,以上研究虽都涉及“三语”,但并没有从三语习得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充其量是“三语习得”的雏形研究或涉及该领域的感性、经验型研究。那么,国内三语习得研究十年来的总体趋势是什么?主要成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呢?

研究者首先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主题为“三语习得”的搜索,获得 136 篇相关论文,通过阅读发现其中 6 篇为相关会讯通知或其他类文章,因而删除。之后又进行了主题“‘三语’、不含‘三语习得’”的搜索,共获得 483 条查询结果,通过阅读摘要,从中挑选出了 107 篇相关文章,进一步阅读全文后删除了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模式及目标、三语教育改革、三语教育现状分析、三语师资培训等类与三语习得研究基本

收稿日期:2016-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青藏地区双语语境下第三语言认知规律问题研究”(12YJA850014)

作者简介:李增垠(1968—),男,青海湟中人,青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无关的文章,保留了与该研究论题相关性较高、影响力较大的 69 篇论文。在获得论文后,全文通读了 199 篇论文,并依据调研大纲将论文作者信息、期刊级别、是否有基金项目、研究对象、研究语言、理论依托、研究类型、研究内容等进行详细分类记录,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期刊学术论文发表总体情况

(一)论文发表时段特点

2000 年至 2015 年间发表的 199 篇三语习得研究文章中,单一年度发表论文数量逐年递增,最多的 2015 年 35 篇,占发表总数的 18.6%;其次是 2014 年和 2013 年,都为 35 篇,各占发表总数的 17.6%;2012 年和 2011 年分别为 33 篇和 21 篇,所占比例为 16.6%和 10.6%。16 年中,三语习得研究成果由一位数增至两位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07 年以前偶有文章涉及此研究领域,8 年间共有 7 篇,年平均数还不足 1 篇;直至 2008 年,才开始连续有研究成果发表;以 2010 年为分水岭,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都是两位数,且从十余篇到二十余篇,再到连续 4 年保持三十余篇,呈现出一个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文章发表时段的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1,未出现年份的统计数据为零。

表 1 三语习得研究成果发表时段

时间	2000	2002	2003	200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文章篇数	1	1	1	4	5	8	18	21	33	35	35	37
比例(%)	0.5	0.5	0.5	2.0	2.5	4.0	9.0	10.6	16.6	17.6	17.6	18.6

(二)期刊级别和基金项目

所统计的文章中,主要发表在《现代外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学刊》等外国语类和《民族教育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民族学类,以及《东北师大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师大学报》等高校学报类共计 118 种期刊上。其中,来自“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的研究成果共 62 篇(31.2%)。共有 115 篇(57.8%)文章受不同层次共 167 项次基金项目的支持,其中国家级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重点基础研发基金)17 项次,教育部人文科研基金项目 32 项次,其他部委及省部级基金项目 30 项次,校厅级项目 88 项次,校厅级项目占基金项目的比例最大,为 52.7%。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高一虹等的分类标准,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两大类。^[6]考虑到 2009 年以前研究成果较少的实际情况,为了方便统计,本研究将此段时间分为两个阶段统计,其他时间按年份统计,结果见表 2。统计结果显示,实证研究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表 2 研究方法

年份	2000—2005	2006—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实证篇数	1	8	4	5	11	8	15	16
非实证篇数	2	9	14	16	22	27	20	21

(四)研究对象及民族

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民-汉-英三语学习者,二是高校外语专业二外、双外语专业、或非外语

专业二外学生。研究对象层次明确为大学生的有 89 篇,占 44.7%;中学生的有 13 篇,占 6.5%;小学生的为 6 篇,占 3.0%;此外,还有外语培训班的学生。不明确研究对象层次的都是民-汉-英三语学习的混合群体,共有 44 篇,占 22.1%。涉及的少数民族多达 15 个,按频次排列主要有藏、维吾尔、蒙古、傣、彝、哈尼、白、苗等民族。

(五)研究者及研究语言

统计数据显示,所有研究者均来自国内高校,无一例外。研究的第三语言多达 8 种,其中,英语的数量最多,超过总量的半数,按篇数比率排列,其他语言依次为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越南语和泰语。

三、主要成果

依据统计数据及分析,概括起来,十余年来国内三语习得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发现及有价值的成果。

(一)名称趋向规约化

术语规范是学术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到新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尚未正式使用“三语习得”这一术语。检索 CNKI 全文期刊库,朱静芬发表在《外语教学》上的“语言迁移对二外学习者英语写作的影响”是学界第一篇正式使用“三语习得”一词的文章。^[7]新世纪前 10 年,学者们以两大类学习者对象进行涉及学习障碍、态度、动机、策略、三语接触、词汇语义通达等多个层面研究,成就不菲,影响力颇大,但在这些研究中,“三语习得”一词曾一度与“三语教学”“三语教育”“三语学习”“少数民族外语教学”等名称共生共用、相提并论。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国内对三语习得的概念术语表达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甚至认为三语习得的概念既模糊又混乱。^{[8]92}新世纪以来,国外多位著名学者曾撰文主张将三语习得视为独立研究领域,^[9-12]这为该术语的规范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国内,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外语类核心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在 2010 年第 2 期上率先开辟了“三语习得研究”专栏,刊登了 3 篇学术论文,标志着我国三语习得学术研究独立领地的开启,可以视为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的一个小小里程碑。尤其是曾丽、李力从六个层面阐述了三语习得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依据,^[13]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的认可,为国内三语习得研究树起了一杆不容忽视的旗帜。李佳认为,较之“三语教育”“三语教学”和“少数民族外语教学”等术语概念,“三语习得”更好地概括了各类群体学习者的背景特征,同时,“三语习得”作为“二语习得”的延续更符合学术规范,其研究的对象更有理论导向。^{[8]93}本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概念术语使用方面,64.8%的研究者都选用了“三语习得”,另有 35.2%的研究者使用了“三语学习”“三语教学”“三语教育”或“二外学习”等名称。因此,“三语习得”一词的使用已经逐渐趋向统一,为该研究领域的多数学者接受并熟知,基本完成了其规约化过程。

(二)研究内容多元化呈现

就研究内容而言,涉及了三语习得研究的多个层面,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统计结果显示,199 篇文章中分别涉及了十余个类别的三语习得理论。其中,列于首位的是“语言迁移”,达到了 82 次;其次为“影响因素”,共计 58 次,主要探讨语言距离、语言环境、文化差异、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者水平等因素;位列第三的是国内外“三语习得综述”,为 21 次。此外,研究内容还涉及语码转换、三语习得与元语言意识、语义通达及语义和概念表征、三语语用产生与语用意识、三语习得与普遍语法及三语习得的其他理论问题、三语学习问题(包括三语学习特点、学习策略、中介语发展、学习能力之类的内容)、语料库建设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涉及“三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的文章数量也不少,基本都是对诸如外语教学启示、外语教学意义之类的探讨。之所以没有将其列入下表,理由一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是三语习得及其相关理论问

题;二是此项内容比较散乱,难以分类,统计的意义不是很大。文章对主要研究内容的统计见表 3,因一篇文章中可能涉及不止一种理论或研究内容,因而统计的次数并不代表文章的篇数。

(三)语言迁移研究成果丰硕

三语习得是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迁移理论的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语言迁移是学者们在三语习得领域中关注的焦点之一。与二语习得中母语迁移现象相比,三语习得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如表 3 所示,国内关于三语习得各类文章中语言迁

表 3 研究内容(前 6 位)

研究内容	提及次数(次)	所占比例(%)
语言迁移	82	41.2
影响三语习得的因素	58	29.1
三语习得综述	21	10.6
语码转换	13	6.5
语义通达和语义、概念表征	8	4.0
三语习得与元语言意识	8	4.0

移研究雄踞首位,几近研究内容总数的一半。作为三语习得研究者关注的第一重点,国内许多学者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多个层面对三语习得过程中的语言迁移做了大量颇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就。裴光钢使用 Audio Recorder Deluxe 软件,以西班牙语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母语和第一外语英语影响下的西班牙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音迁移现象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了多语际语音学习中各语言间的迁移关系和规律,为三语习得及外语教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经验;^[14]朱静芬通过比较和分析一外法语水平不同的中国学生学习二外英语时受母语汉语和一外法语影响的情况,结果发现一外水平越高,词汇量越大,语言负迁移可能性也越大;^{[7]53}张玉玉对英语专业的维族大学生在英语写作中的语法偏误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结果显示,母语维语和二语汉语都是造成语法偏误的因素,但这两种语言的影响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交错的;^[15]田有兰、刘彬以民-汉-英三语学习为视角,从语用语言迁移与社交语言迁移两个方面对傣、彝、白、哈尼族学生英语学习过程进行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这四个民族的学生在语用语言迁移和社交语用迁移上都存在迁移错误,而造成此类迁移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恰当地在语义和句法上寻求与母语的对应,说明在目的语交流中对语用策略的掌握存在着较大问题。^[16]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绝大多数迁移研究都集中在母语、二语对三语习得的影响上,而探讨三语对二语习得逆向影响的成果却十分少见,显得颇不对称。可喜的是,倪传斌、张之胤的研究填补了此项国内空白。他们以 E-prime 作为研究工具,以国内高校外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用实验来探讨三语对二语词汇识别的逆向影响,结果显示:语言距离越近,三语对二语的逆向影响越大;此外,从语言水平视角来看,即使处于较低水平的三语,也可能对处于较高水平的二语产生逆向影响。^[17]

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看,三语习得领域的迁移研究中有效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不断改进,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所得结果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四)影响因素研究颇有成就

统计数据显示,影响三语习得的因素研究是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第二大重点。影响三语习得的因素非常多,综合国外学者之观点,语言距离、习得顺序、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年龄、语言环境以及某种语言的使用近现率等多项因素都对三语习得产生影响。

国内关于三语习得中影响因素的研究颇有成就,既有针对整体影响因素的理论探讨和研究综述,也有针对一个或多个特定因素的实证性研究;研究内容趋向细化,研究方法不断得到提升。刘承宇、谢翠平用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国内某高校外语专业学生二外学习中在语言距离、学习顺序和语言水平层面表现出的跨语言影响因素进行探查,所得的主要结论是影响二外学习的因素很多,其中语言距离影响最大,学习者的外语水平次之,外语学习的顺序最小;^[18]欧亚丽、刘承宇以语言距离为理论基础,以 Kellerman 假设

为研究路线,分析了某高校蒙古族学生在英语语音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及其成因。结果发现:学习者所感知的心理语言距离的影响超过了客观的语言类型距离的影响,这与国外的大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19]蔡凤珍、杨忠依据 Cummins 的门槛假设与相互依存发展假设,以新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学生为样本,对二语汉语在其三语英语习得中是否有显著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二语与三语高度相关,二语水平对三语习得有显著影响:汉语水平的高低完全与英语水平成正比,且学生们都是通过二语而不是其母语来习得三语的;^[20]金英从双语类型、二语和三语接触程度、语言距离、心理语言类型与可迁移性、语言模式等十个方面对国外三语习得的跨语言影响研究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是目前国内学者较为全面地介绍和阐述国外三语习得中跨语言影响因素研究的期刊论文。^[21]

三语习得不仅受到语言环境、语言接触、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宏观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学习者的年龄、性别、语言学能、语言背景、学习风格或认知风格等个体因素以及言语交际语境等外在因素的制约。总的来看,国内对三语习得跨语言影响因素的研究产出了不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为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的亮点之一。

(五)国外专著译介及三语习得综述作用不容忽视

在国内三语习得研究领域,译介国外相关成果、综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该领域的研究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在译介国外专著方面,数量虽不多,但影响力却不小。刘承宇和谢翠平基于 Cenoz 等编撰的论文集《第三语言习得中的跨语言影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评介了国外多位学者从心理语言学视角对第三语言习得中跨语言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处在初始阶段的国内三语习得研究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22]雷蕾对 De Angelis 编著的《三语或多语习得》进行了评述,并特别指出,该书对国外已有的三语及多语习得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是关于三语或多语习得研究不可多得的入门佳作,对后续相关研究将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23]常辉对 Leung 编撰的《第三语言习得与普遍语法》做了介绍和评述,作为第一部基于生成语法理论的三语习得研究论文集,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视角深度探讨了成人在三语习得中普遍语法的可及性以及语言迁移问题,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24]类似的专著译介仍在不断出现,这将给我们不断提供新内容、新方法和新视野,从而大大地推动国内三语习得研究。

在对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综述方面,不少成果值得一提。杨轩对国外学者提出的三语习得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二语习得的主要差异做了归纳和评述,并对三语习得的定义进行了大胆的界定和分类。^[25]⁷⁵曾丽对国外三语习得研究的缘起、现状、特点以及研究涉及的层面做了详细的综述,对三语语际迁移研究、元语言意识研究以及三语习得与普遍语法研究的成果做了系统的梳理;^[26, 27]李佳从影响三语习得的因素和促进习得的因素两大方面对国内国外的三语习得研究成果及其特点进行了混合式的综述,并指出国内研究应加强从理论向实证的过渡,扩展三语学习研究对象,重视民族地区外语师资研究并提出适合我国三语教学的本土化解释;^[8]⁹⁴袁庆玲在介绍国外三语习得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对已有国内三语习得研究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的前景展望。^[1]⁴⁹魏亚丽、彭金定从影响三语语言迁移的因素和三语语言迁移发生的词汇和句法层面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了系统的评述,同时指出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对我国多语环境下的三语习得迁移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8]

总之,对国外专著的述评有助于国内更多的学者更加便捷地了解国外三语习得的研究内容及其发展状况,其作用不容忽视。而对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进行综述能及时地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日后研究的趋势,可以为更多有志于三语习得研究的国内学者铺上一条更加坚实的研究之路。

四、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十五年来国内三语习得研究取得了不少值得肯定的成果,尤其是在局部层面不乏独到见

解和深邃观点,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有效的实证研究不足

国内已有三语习得研究主要有两个倾向,一是多偏向于现有理论的阐释和对国外研究的介绍;二是多数研究仅限于三语习得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的困难以及相关策略,其内容太过笼统、宏观,方法相对单一。本文统计的 199 篇文章中虽有 68 篇为实证类研究,但就收集数据的方法而言,简单的调查问卷及访谈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这较难避免被试者对问题理解的主观性,而影响力大、针对性强、微观性高的深度实证研究还很欠缺。譬如,民族种类、语言背景、个体特征等不同的学习者在认知特征上有何差异,还缺少系统、全面的实证材料。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多地考虑采用或结合其他诸如任务测试、有声思维、个案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采集数据,尤其是有声思维,它是心理学研究中获取数据的十分常用方法之一,在三语习得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就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三语习得影响因素研究而言,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对其做全方位、多变量的研究,尤其是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对其进行动态考察,并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心理语言学、发展心理学、语用学进行多视角研究,就一定会揭示出更多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对象范围狭窄,背景信息细化不够

国内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少数民族三语(主要是英语)学习者以及英语专业二外学习者,并且以成年人为主,多集中于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小学生的研究涉及甚少。然而,在我国广阔的农牧区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多民族语言、多方言并存的语言环境,找到丰富的研究素材和研究群体,因而可以利用自身的语言环境优势和资源探索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三语习得研究模式,尤其是不同民族的少年儿童更应该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在此问题上,杨轩的观点值得一提,他认为中国的语言学习者中至少有六种类型属于三语习得的研究范围:分别是涉外双母语者、非涉外双母语者、双母语环境者、方言性双母语者、外语专业背景学习者和非外语专业背景学习者。^{[25]73}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我们客观地分析研究对象,国外三语习得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移民群体,这与我国民汉双语之后学习三语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因而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结论,特别是三语间语际迁移方面的理论,因为不同民族在学习三语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现象不尽相同,我们应注意研究三语习得群体的民族特征以及个体特征,以期对该领域进行本土化阐释和应用。

此外,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以及对外汉语推广事业不断推进,目前在国内外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且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把汉语作为第三甚至第四语言来学习的,他们成了我们研究三语或多语现象的新的理想群体。由于汉语与印欧语系的差异较大,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并且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的内容。

另一问题是现有成果对研究对象的语言背景细化不够,笼统地将一些用宏观标准分类的群体放在一起,得出的结论缺乏独有的特性。譬如,同样是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他们的民族语和汉语的水平通常会有较大的差别,有些属于民汉两种语言都达到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平衡双语者,而有些却可能是民强汉弱或民弱汉强的非平衡双语者。对于这样的群体,若进行细化区分就很可能挖掘出一些十分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特征。

(三)研究的针对性不强,研究内容尚需深化

首先,现有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有关三语教育或三语学习的宏观理论阐述,由于缺乏一定的深度和针对性,很难从根本上对教学实践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适度缩小研究框架,同时加强研究的针对性。比如,可深度探索少数民族学习三语的规律、特征及问题,从而有力地指导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和三语教学。

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其广度和深度尚需拓宽和加深。广度方面,三语习得与普遍语法的关系、儿

童早期三语现象、元语言意识中的语用意识、三语习得中的焦虑、三语习得过程中的语言损耗等内容还未涉及。深度方面,已有研究仍显不足,比如,即使是成果不菲的迁移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是研究的焦点基本局限在以三语为终点的正向迁移上,几乎没有以三语为起点的逆向迁移研究;二是已有研究大都只停留在词汇和句法层面上的迁移现象,而语音、语义、语用以及认知等方面的迁移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三是正迁移的优势未被有效利用,负迁移的劣势却被过多放大;四是对三语间的很多迁移现象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仍没有结论。

第三,为了促进三语习得研究的纵深发展,在未来研究中,应当对已有研究成果也进行深入验证和实际应用。比如,国外学者认为,多语习得与元语言认知具有正向关系,即语言习得者的多语学习经历会对其元语言意识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那么,诸如“这些积极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如何以此提升语言学习的有效性?”“二语认知水平对三语习得有何影响?”之类的问题都亟待深入探析。国内学者们应当扩展视角,将三语习得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文化学等领域相结合对其展开跨学科研究。

(四)学术界重视不够,宏观发展严重不足

国外学术界对三语或多语习得研究的重视程度从出版机构和相关期刊中可见一斑,譬如,“Multilingual Matters Ltd”是著名的国际性出版社,已出版众多三语或多语习得研究方面的专著,其网站 <http://www.multilingual-matters.com> 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文献资源,在三语和多语习得研究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等都是针对该领域研究的著名期刊,并且开辟了多个栏目,为三语及多语习得研究搭建了专门的学术平台。此外,“Applied Linguistics”“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Second Language Research”等期刊或设有三语习得专栏,或不时地刊用相关研究成果,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三语习得的研究。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既没有专门的学术期刊,也没有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出版机构,就连相关的专栏在国内各大学术期刊也较难寻觅,虽在有些期刊中偶能见到相关文章,但大都将其置于语言学的大栏目中刊出,很难形成系统研究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该领域在国内学术界的宏观发展以及其应有的地位。因此,需要国内学术界对三语习得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像二语习得研究一样,成立研究协会,举办年会,在部分相关的核心期刊中开辟专栏,从而推进三语习得在我国的实质性发展,为外语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三语类型的外语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并使其得到有效、快速发展。

五、结语

三语习得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大致起始于新世纪初。十余年间尤其是近五年来,国内研究者在三语习得领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在某些层面上的研究已有相当建树和影响力,如其名称已基本完成规约化,研究内容多元化呈现,语言迁移研究日益成熟、方法日趋科学,对影响因素的研究愈加深入、细化,国外专著不断被引进,研究成果不断得到总结。然而就整体而言,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在研究方法、对象、内容以及宏观发展状况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希望今后国内更多的研究者,特别是具备一定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之中,积极利用其他相关学科中的先进技术手段,从语言、社会、心理和文化等非语言层面对三语习得过程进行多视角、多维度地探析,从而使三语习得研究早日成为真正的独立研究领域,促进国内三语教学的实质性发展,特别是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我国少数民族“民-汉-外”模式的外语教育中,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实质性的指导,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的有效性,实现构建适合中国学习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学习者的三语习得理论及教学模式的蓝图。

参考文献:

- [1]袁庆玲. 三语习得国内外研究综述[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0(6).
- [2]韩曙光, 刘永兵. 西方三语习得研究对我国外语研究的启示[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6):136-139.
- [3]吴布仁. 试谈蒙古族教育中的“三语”教学[J]. 中国民族教育, 1996(4):29-30.
- [4]余惠邦. 论中国的双语制[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5):36-41.
- [5]扎巴. 内蒙古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4):33-36.
- [6]高一虹, 李莉春, 吕王君.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J].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1999(2):8-16.
- [7]朱静芬. 语言迁移对二外学习者英语写作的影响[J]. 外语教学, 2000(1).
- [8]李佳. 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评述[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 [9]HERDINA, P. & JESSNER, U. *A Dynamics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 Perspectives of Change in Psycholinguistics*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2:85-88.
- [10]JESSNER, U. *Linguistic Awareness in Multilinguals: English as Third Languag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1]JORDA, M. *Third Language Learners: Pragmatics Production and Awareness*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5: 50-75.
- [12]DE ANGELIS, G. *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Acquisition* [M].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 [13]曾丽, 李力. 对“三语习得”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2):6-9.
- [14]裴光钢. 多语际语音迁移实例研究及启示[J]. 山东外语教学, 2010(4):46-49.
- [15]张玉玉. 维吾尔族大学生在英语写作中中介语语法偏误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5):155-157.
- [16]田有兰, 刘彬. 三语语用语言迁移与社交语言迁移对比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127-131.
- [17]倪传斌, 张之胤. 三语对二语词汇识别的影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6):30-34.
- [18]刘承宇, 谢翠平. 外语专业学生第二外语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1):43-47.
- [19]欧亚丽, 刘承宇. 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4):93-97.
- [20]蔡凤珍, 杨忠. L2(汉语)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L3(英语)习得的影响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2):10-13.
- [21]金英. 国外“第三语言习得的跨语言影响”研究[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87-90.
- [22]刘承宇, 谢翠平. 《第三语言习得中跨语言影响的心理语言学》述评[J]. 当代语言学, 2006(4):372-377.
- [23]雷蕾. 《三语或多语习得》述评[J]. 现代外语, 2010(2):213-215.
- [24]常辉. 《第三语言习得与普遍语法》评述[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4):95-96.
- [25]杨轩. 三语习得有关问题研究[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9(5).
- [26]曾丽. 国外“三语习得”研究—缘起与进展[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143-146.
- [27]曾丽. 国外“三语习得”研究述评[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1(1):10-13.
- [28]魏亚丽, 彭金定. 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评述[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119-125.

Review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in China since 2000

LI Zengy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overall situation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TLA) research in China since 2000,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such five aspects as conventionalization of the term,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contents, the achievement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transfer, the achievement of research on cross-lingual factors and the role of relevant foreign works. Meanwhile,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exist four aspects of deficiency in the current studies. Firstly, the research method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effective empirical researches are insufficient. Secondly, the scope of subjects is too narrow, and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s not refined enough. Thirdly, the present researches lack pertinence,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s still need to be deepened. Finally,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have not received due academic attention, and there still exists a serious lack of macroscopic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In view of this,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eds to be studied from multi-perspective at different levels with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Key words: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in China; review

(责任编辑:魏 霄)

(上接第 88 页)

- [7]郑成宏. 韩国文化产业现状与借鉴[J]. 当代韩国, 2012(3):33.
- [8]齐骥. 理论与实践: 中国文化产业十年总揽(上)[J]. 学术探索, 2012(2):95.
- [9]胡智锋, 杨乘虎. 引领力: 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诉求[N]. 光明日报. 2015-06-29 (014).
- [10]周叶中. 加快文化立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J]. 求是, 2012(6):59.
- [11]张兆安. 文化产业立法突出扶持原创力[N]. 人民法院报. 2017-04-22 (005).
- [12]张秉福. 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现状与问题探析[J]. 图书与情报, 2012(4):39.
- [13]郭玉兰. 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的法律体系[J]. 理论探索, 2004(05):111.

Development Trend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Blue Economic Zone of Shandong Peninsula

LI Huixun, ZHOU J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 Blu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urrent strategic support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Blue culture and Blu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The orientation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of cultural industr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dustries in the Zone in terms of industry scal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content; in the cultural concept, follow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led, multi-participation, policy-motivated, and legislative protection to construct a cultural industry belt to fit the blue economic zone construction, and form the interactive tre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lue economy and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blue economy; cultural industry; creative industry; interactive trend

(责任编辑:魏 霄)